

§语言·文学·艺术§

二元对立中的欧洲认同 ——以19世纪欧洲文学艺术为例

易丹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19世纪欧洲发展的一大特征,是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民族国家建设。在此过程中,欧洲文化认同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尽管存在着浪漫主义关于整体欧洲的构想,但这些构想却不能在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实现。与此同时,欧洲向海外的扩张,却在欧洲之外为不同的欧洲国家公民提供了文化认同的想象空间,尽管这种想象往往伴随着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主义的价值判断。

关键词: 19世纪欧洲文化发展; 欧洲认同; 全球化语境

中图分类号: E. 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09) 04-0114-08

欧盟(EU)和欧洲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试验之一。在承认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前提下,欧盟成员国以民主的方式协调发展出一个在经济、政治和防务等领域超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泛欧洲体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恢宏的计划。然而,由于欧洲政体依然延续民族国家的范式,超越民族国家的泛欧体制就必然波及国家认同与欧洲(或者欧盟)认同的复杂局面,造成现有欧洲一体化进程频频遭遇多重身份认同的困境^[1]。欧盟虽然制定了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加强欧盟各成员国的欧洲认同的指导性文化政策,但迄今为止,这个“统一的多元化”原则并没有在实际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显现出更为有效的作用,各成员国中的所谓欧洲认同并没有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得到提升。相反,在许多事关重大的决策过程中,民族国家认同及其连带的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甚至民族主义情绪却充斥或占据了话语空间。原因之一,是因为半个多世纪的欧盟建设似乎更多集中于经济层面的整合和政治层面的协调,文化认同的推进却相对滞后。而更重要的是,所谓共同的“欧洲文化认同”的建设,与19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民

族认同为基础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基本框架相背离。因此欧洲认同的确立,就不得不面对各民族国家在文化认同上的相互区分的格局。可以说,19世纪所建立的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是欧洲认同的最直接的“防火墙”。

然而我们也看到,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诞生时所出现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建设过程,虽然在欧洲之内形成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认同差异,却不能阻止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语境中形成。换句话说,在19世纪,欧洲文化认同无法产生于欧洲内部,却在欧洲和世界之间,在欧洲的“我们”和非欧洲的“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凸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欧洲认同往往是建立在欧洲国家的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所谓“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文化沙文主义基础之上。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欧洲的“我们”与非欧洲的“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关系中充斥着偏见和歧视。本文试图从文学和艺术的某些个案,来梳理这种二元对立关系的脉络,从而为我们理解19世纪的欧洲文化认同,提供一条思考线索。

收稿日期: 2009-03-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及启示研究”(08JA810018)成果

作者简介: 易丹(1960-),男,四川汶川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教授。

一

1824 年，旅居巴黎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接受了路易十六最年轻的弟弟查尔斯十世的委托，给他的加冕写作一部歌剧。

罗西尼创作出来的歌剧叫《莱姆之旅》(Il Viaggio a Reims)，情节与英格兰作家乔叟的《坎特布雷故事集》十分相似：一群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旅行者在前往莱姆参加加冕典礼的路上，在一个温泉小镇逗留。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无法继续旅程，于是就在小镇上自己搞了一次庆祝。歌剧的主要内容，便是这个在小镇上举行的歌舞晚会。表演者中，有善于风情和打扮的法国女伯爵，踩着脚跟跳弗拉芒戈舞的西班牙贵族，当然也有和军乐队一起表演的德国男爵。与这些人物的文化身份相吻合，罗西尼采用了不同民族的音乐主题，包括不同国家的国歌以及民歌素材。最后，在一个充满和谐的各民族大联欢中，歌剧落下帷幕。

对于 1824 年的欧洲而言，罗西尼的歌剧显然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经过法国大革命和大革命之后的拿破仑征战，欧洲的统治者现在需要有一种和平的气氛，各个君主国之间需要找到一种共同的和谐。罗西尼的歌剧当然就是对这种和谐呼唤的音乐回音。1797 年，罗西尼的父亲，一个意大利雅各宾党人，在面对法国军队的时候曾经热烈欢呼拿破仑对皮萨罗和整个亚平宁半岛的“解放”。将近 30 年后，他的儿子把法国人、西班牙人和德国人放进一出既表现了民族特色的多元又表现了欧洲国家之间和谐相处的歌剧，让他们放声歌唱永久的和平。从某种程度上讲，罗西尼的作品代表了 19 世纪整体欧洲的某种理想，代表了对欧洲一体的某种文化期待。

不过事与愿违，在罗西尼的歌剧在宫廷上演之后的许多年内，欧洲并没有见证到一个和谐的共同体，多民族的文化和谐、整体的欧洲认同并没有出现。恰好相反，在接下来的欧洲历史里，倒是充满民族主义热情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直至战争，成了绝对主角。在这个历史的歌剧舞台上，主旋律不是和谐的大合唱，而是不同民族国家——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等——的不同民歌和国歌成了最为悦耳最为强烈的音符。欧洲认同

仿佛只是一个游走于欧洲的幽灵，在知识分子的话语中阐发过，在小说家、诗人和音乐家的脑海里闪现过，却在欧洲的国家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地内不曾找到实在的躯体，在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版图上从来也没有真实地现身^{[2]170,77}。

与此情景相对应，在另外一个舞台上，却上演着另外一出歌剧。这出歌剧不再是庆祝欧洲某个君王的加冕，也不再是几个欧洲国家的贵族凑在一起展现自己民族的音乐和舞蹈特色。在这个更大的舞台上的表演者，脚步已经早就跨越了欧洲的版图，遍及非洲、亚洲和美洲。他们以探险者、贸易者、征服者、统治者、传教者、发现者和研究者的面目登台，和那些非欧洲国家和文化的角色一起上演了一出充满想象和幻觉的悲喜剧。最有意思的是，不论这些表演者来自哪个欧洲国家，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和民族背景，也不论他们所在的民族国家建立时间有多长或多短，当他们和非欧洲的角色混杂在一起时，他们往往被和谐统一地看成是欧洲人，他们获得了一个在欧洲之内的舞台上很难获得的共有的文化身份^{[3]177,79}。

一边是互不相让的民族主义热情高涨，各种特色文化被有意识地抬举，民族性被政治操作无限加强，从而造就了直至今天仍然统治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另一边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身份认同，民族国家的身份疆域在共同的想象体中被淡化甚至消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让位于笼统的欧洲镜像。这个看起来十分矛盾的现象出现在 19 世纪并不是偶然。或者反过来说，也只有 19 世纪这样一个独特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这种独特的、充满内在悖论的文化认同。

二

1821 年，在罗西尼的歌剧《莱姆之旅》成型之前 3 年，英国人德·昆西开始在《伦敦杂志》发表自己的连载：《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德·昆西本人是一个瘾君子，自从第一次因为牙痛与鸦片接触之后，便常年与鸦片为伍而不可救药。写这本小册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需要用版税来支撑他继续吸食的生活。在这部轰动一时、颇具文采的作品中，德·昆西描写了自己吸食鸦片之后的种种幻觉。其中有这样一段关于鸦片幻觉中的东方形象的文字：

……所有这些东方梦幻, 都伴随某种恐怖气氛, 很少有例外的。恐怖首先是自然环境的, 然后才是道德与精神的恐怖。造成自然环境的恐怖的, 主要是一些怪鸟、蛇、鳄鱼, 尤其是鳄鱼。该遭诅咒的鳄鱼对我来说比其他东西更可怕。可我不得不与鳄鱼在一起生活许多世纪 (我的梦里总是这样)。有时逃脱了, 逃到一间中国房间里, 摆着几个藤桌藤椅, 突然之间所有的桌椅都变得活动了: 巨大丑陋的鳄鱼头又出现了, 它那双贪婪的眼睛死盯着, 幻化成成千上万只闪着绿光的眼睛飘浮在空中: 我站在那里, 又恨又惊, 这种可怕的两栖爬行动物经常出现在我的东方梦境中; 而且多少次, 同样的梦以同样的方式突然中断: 我听到温柔的声音在呼唤我 (我睡觉时能听到任何响动); 我即刻醒来, 已经是晌午的阳光了; 孩子们手拉着手, 站在我的床前; 给我看他们漂亮的小鞋, 新上衣, 或者让我知道他们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我从可怕的鳄鱼与妖魔鬼怪的梦中世界突然回到温馨的家, 看到纯洁的人性、童真, 两种景像的对比是那么强烈, 我禁不住亲吻孩子们娇嫩的小脸, 泪水夺眶而出^[4]。

邪恶的怪鸟或者鳄鱼与德·昆西的东方幻觉粘连在一起,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 这是那个时代常见的一种欧洲人对东方或者中国的想象。至于德·昆西在写作这样的文字时, 到底具有多少东方知识也不重要, 这不仅因为德·昆西描写的是自己在迷醉状态中产生的幻觉, 也因为在那时的欧洲, 所谓东方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 既可能是小亚细亚, 也可能是阿拉伯地区, 还可能是印度和中国、日本。同时, 东方知识并没有成为一种系统性的知识, 没有真正触及到东方或者中国的现实, 虽然在那时有许多与东方相关的文字出版。

真正让人感兴趣的, 是这段噫语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出现的那个场景。德·昆西从有关东方的噩梦中醒来, 中国房间里活动的桌椅, 巨大的丑陋的鳄鱼头……这一切让作者心惊肉跳的形象被正午的阳光取代, 骇然惊醒的作者“突然回到温馨的家, 看到纯洁的人性、童真”, 看到对比如此强烈的景象, “泪水夺眶而出”。鲜明的对

比当中, 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母题, “东方”和“我”。毫无疑问, 在德·昆西描述的场景区里, “东方”是邪恶的、充满恐惧的他者, 而“我”和“温馨的家”则代表着这个他者的对立面: “纯洁的人性”。进入那个被鳄鱼占据的中国房间, 是“我”对东方的想象冒险; 从噩梦中醒来, 则是回到充满人性的家园。他者的阴暗存在, 见证了“温馨的家”的人性的纯洁。

事实上, 这正是 19 世纪许多具有“国际视野”的欧洲话语的共同特色。正是在这些话语之中,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 在想象空间里以自我肯定的意识和情感展现出来。

启蒙运动时代, 欧洲的知识阶层或者知识精英对东方、对中国有大量的言说, 其间包含了许多乌托邦式的想象, 也包含了许多欧洲自身的文化和精神投射。无论是孟德斯鸠, 还是伏尔泰、莱布尼兹, 以及卢梭, 都在自己的作品里阐述了他们对东方或者中国的认知。这当中有正面的道德主义的描述, 也有反面的对东方社会机制的批驳。然而不管是褒是贬, 东方或者中国俨然成为欧洲知识圈话语的参照系却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对欧洲自身的反思, 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第一次在欧洲的人文话语中正式引入了他者因素, 并以他者的存在作为阐释欧洲文化或者文明特征的镜子。值得一提的是, 也正是在这个时代, 在这样一种语境当中, “文明” (法文 *civilisation*, 英文 *civilization* 或者德文 *Zivilisation*) 正式成为术语^{[5][6]}。从某种意义上讲, “文明”概念的出现, 是启蒙主义者 (以及紧随他们步伐的浪漫主义者) 试图为欧洲描绘一个以全球为参照的文化地图的结果。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中, “欧洲”这个条目是由姚柯 (Chevalier Jaucourt) 撰写的。很显然, 他在这里引入了全球的概念, 将“欧洲” (或者可以翻译成“欧罗巴”) 与另外三个大洲并置, 从而企图以对比的方法说明“欧洲”的特征:

如果欧洲是世界另外四大部分中版图最小的一个的话, 它却是它们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 它的贸易, 它的航海, 它的丰饶, 它的启蒙和工业, 以及它的关于艺术, 科学和商业的知识^[6]。

这种全球化参照系的运用, 当然是为了堂而皇之地说明一个问题: 作为一种文明的欧洲相对于世

界其他地方来说，它的优越性和在文明阶梯上的先进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欧洲与世界的二元对立框架，到了 19 世纪被发扬光大了。

作为 19 世纪欧洲最杰出的哲学家，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运用了这种二元对立框架。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 (Weltgeist) 的逻辑是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原则，逐渐脱离所谓“物质”而进化上升至绝对精神。在他的历史哲学中，这种进化分为四个阶段：东方阶段，希腊阶段，罗马阶段和基督教—日尔曼阶段。东方阶段因为与“物质”最为接近，所以处在进化阶梯的最低级，而欧洲或者“基督教—日尔曼”则已经达到了东方或者世界其他地区无法达到的高度。马克思的论述与黑格尔有相似之处。他认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从低级社会体制向高级社会体制的进步，其中，资本主义作为向无阶级无剥削社会的过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东方或者中国的农业专制社会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改造，因而就没有向更高级社会进化的可能。所以，东方或者中国有必要进行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改造，脱离半开化半野蛮的社会体制^{[7]131, 133}。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在欧洲已经呈现负面作用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却可能是救世良药。此后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也继承了这样一种二元传统，进一步指出欧洲之所以能够全面实现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着亚洲或者东方所没有的文化基础：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伦理精神。正是因为欧洲具有这种精神的独特性，使得它有了世界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繁荣。总之，在 19 世纪，所谓“文明”的内涵被进一步确立了：“文明的概念有了一个明确和正面的含义，与日渐增强的欧洲的优越性相吻合。……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段和层次被区分开来，……而欧洲应该被看作是文明的最高阶段。”^{[5]164}甚至，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中，“文明”一词几乎成了欧洲的专属称谓：“（这个词）用来指谓欧洲文明，而文化则用来指谓那些非欧洲的文化。亚洲和非洲属于文化，而欧洲则属于文明。”^{[3]193}

三

与这种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文话语相关联，19

世纪欧洲涌现了大量与他者有关的文学作品。根据萨义德的统计，从 1800 年到 1900 年间，欧洲出版了大约 60000 多部与“东方”或“近东”有关的著作^[8]。在这当中，既有旅行文学和科学或伪科学的观察纪实作品，也有充满写实或幻想的诗文。这些由传教士、贸易者、探险家和旅外作家为写作主体的文字，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哲学家或者人类学家对欧洲之外的文明和文化的推论。

普鲁士传教士兼鸦片贸易者卡尔·古茨拉夫 (Karl Gutzlaff) 也许是这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古茨拉夫是新教传教士，是欧洲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开拓者，但同时也是从事鸦片贸易的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出售鸦片包裹着的最后拯救”）。1847 年，古茨拉夫发表了一本名为《中华帝国历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ichen Reiches) 的著作。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他明确地写道，中国人冷漠无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说谎者，他们的生活如动物一般，因此，欧洲人有义务用基督教对中国人进行彻底的改造和拯救^{[7]135}。作为中国文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古茨拉夫的描述和见解与当时欧洲的主流东方知识体系一脉相承，将中国或者东方与欧洲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发挥到了某种极致。从古茨拉夫的“历史”眼光回过头来，去看德·昆西对东方的迷幻文字，二者之间的联系就已经非常明确。

当然，19 世纪欧洲所生产的关于东方的异域书写并不都是如此轻率的负面描述。德·昆西的同胞，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吉卜林的异域生活给他带来了极为丰富的异域想象。这位被冠之以“帝国诗人”或者“帝国主义诗人”的印度殖民者后代以小说、游记和诗歌向英国的读者展现了另外一种东方景象，充满异域情调的诱惑，有时还兼杂对非西方人（或者非白人）的种族的友好认知。然而就是在吉卜林的作品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二元对立作为意义产生的潜在框架在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吉卜林的游历和写作生涯跨越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但从本质上讲，他仍然是一个 19 世纪的写作者。发表于 1926 年一本集中的诗《我们和他们》，最明显不过地体现了这种二元对立结构。这首诗是对儿歌的戏拟，调子轻松诙谐，但其中隐含的文化主题却相当严肃：

爸爸妈妈和我
姐姐和舅妈都说
和我们一样的人们是我们，
其余的人们是他们。
他们在海那边生活，
我们在这边过活，
但是你会相信吗？——他们看着我们

只是另一类和他们一样的人！
我们用牛角刀把的餐刀
吃着猪肉和牛肉。
那些从树叶上抓饭吞咽的他们
被吓得晕了头；
……^[9]

随着诗行的展开，作者依次展现了“他们”和“我们”之间的生活习性差异。在诗的结束段中，诗人总结说，“我们”一再被教育，“他们”是和“我们”这些“好人”相区别的人，但只要去到“海那边”，你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和“我们”一样，都属于好人，只是类别不同而已。与德·昆西的那段关于东方的迷幻文字相比，吉卜林的这首诗似乎采取了更加宽容和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外在于欧洲的他者。

在这首诗中有两个微妙之处值得注意。第一，当然是诗人强调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绝对差异，生活习性，文化……正是这种差异，构成了“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对立。与此同时，这里的观看主体并不是单数的“我”，而是具有无限外延可能的“我们”，也就是说，吉卜林试图把个人经验放大成民族经验，在这种放大过程中，“我们”之间的认同便不言而喻。第二，吉卜林非常明确地提示了，其实“我们”在观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在审视“我们”，“我们”对“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同样也对“我们”感到骇然。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相互观看的过程中，“我们”才知道了“我们”是“好人”，“他们”也是“好人”，只不过类别不同而已。吉卜林发表于 1899 年的更著名的诗作《白种人的负担》，不仅比《我们和他们》更能说明所谓“帝国诗人”的文化立场，也为这首《我们和他们》提供了更为明确的身份定位参照：“我们”并不只是游历和居住在东方或者印度的英国人，而是一个更大的

概念——“我们”是西方人，或者欧洲人（美国人也是欧洲人的延伸），或者说更明确地说，是白人。

亲历也好，想象也好，正面也好，负面也好，种族偏见也好，文化尊重也好，都是建立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性有时甚至是否定性关系之中的。“我”与“他们”之间的区别，最终会使“我”认知“我们”共享的同一性。在 19 世纪欧洲带有全球语境的话语当中，这种共享的同一性往往就是“欧洲性”，或者欧洲身份。正如古茨拉夫所说，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有义务解救非基督教的“他们”，一个单数的普鲁士传教士的“我”，与基督教精神和基督教文化的“我们”在此语境中合二为一。同样，当吉卜林感叹“白人的负担”之时，当他试图说服自己的同胞采取更为理性的眼光去观看和审视异域的时候，他所说的“我们”也就包括了在“帝国的时代”向外大肆殖民和移民的欧洲人^{[10]63, 257}。

四

1865 年，一幅油画作品在巴黎的艺术沙龙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E·马奈的《奥林匹亚》。沙龙的观众和批评家们对这幅作品的反应后来被许多艺术史家用“愤怒的风暴”来形容。他们不能容忍马奈对画面的种种处理，把这看作是对艺术的亵渎。然而，马奈的这幅作品和另外几件也曾引发议论的作品一起，已经成为印象派绘画的经典。



(图 1)

(图 2)

马奈的《奥林匹亚》(图 1)显而易见是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代表人物提香作于 1538 年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图 2)的一次戏拟。提香使用的画面母题，被马奈肆无忌惮地世俗化或者说“现代化”了。两幅作品的画面母题、形式构成、影调对比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激发了当时和后来的批评家们的各种解读。不过，在这篇论文的语境里，如何重建马奈这幅作品的原始创作意图已经没有意义。我

在这里引用这两幅作品，只是把它们当作整体性符号，或者说当作具有象征意义的图像隐喻。因为，在这个图像的隐喻中，前文所述的“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二元对立结构再次凸现了。

提香作品背景中的两个女性，与前景中的“维纳斯”之间的主仆关系暗示并不强烈，尽管有的解读认为，两个女仆正在为她们的主人寻找衣物。而马奈作品中的黑人女性虽然不一定是奴仆身份，她与“奥林匹亚”之间的主从关系却十分明显。当然，最为重要的不是这种人物之间的假定关系，而是两幅作品中所显现出来的不同意义构成框架。提香的作品中，“维纳斯”的白皙皮肤被身后的深色墙面所衬托；而在马奈的作品中，“奥林匹亚”的这种衬托却多了一个最醒目的元素：黑人女性自己的深色皮肤。如果联系到马奈作品中两个人物显而易见的主从关系，这幅作品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就正好契合了上文所阐发的观点，即，自我身份的认同，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奥林匹亚”的白皙之美（或者如一些评论家所说“苍白之美”），不仅因为光影对比的存在，更因为黑人女性深色皮肤的存在而得到了加强。我们甚至可以说，仆人的黑更强烈地烘托出了主人的白。

追述黑人到达欧洲的历史，以及欧洲贩奴的历史，也许可以为我们解读这两幅作品之间不同的意义带来更多的精彩角度。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不可忽略的是，许多研究者在讨论 19 世纪的欧洲认同时，都将种族差异作为一个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方面。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认同在那个时代里，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族主义的色彩^{[3]97}。

欧洲之所以成为欧洲，是因为欧洲的白人与其他有色人种形成了整体性的对比。二元对立结构在这里显现为我们他们，白人/有色人种，先进民族/落后民族，主人/仆人，优秀人种/劣等人种……换句话说，欧洲的白人在观看欧洲之外的他者时，对自我身份的肯定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最终界限：“我们”是白人或者欧洲人，“他们”是有色人种或者非欧洲人^[11]。在这个最终界限面前，或者说在这个最终界限的作用下，当欧洲人面对“在海那边生活”的其他人的时候，他们的个性特征（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甚至不同的经济和社会阶层）都统统变得模糊起来。

因为这个最终界限，无论是巴黎的人类学者或人种学者，还是阿姆斯特丹的归航水手，都往往会把非白人划归一个大类，与此同时也把自己划归白人（欧洲人甚至是发达的西欧人）的阵营；也因为这个最终界限，在印度出生的吉卜林在承认“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的同时，也忘不了“白种人的负担”；还是因为这个最终界限，一个在伦敦东头无所事事的街头混混，到了印度的孟买却仅仅因为自己是白人，就体会到了欧洲人作为主子的尊严^{[10]178}。

同样因为这个最终界限，马奈的《奥林匹亚》中的白人女子和她的黑人仆从之间就不仅仅只有影调和构图上的关系了。画面中谁是主体、谁是陪衬已经明确，她们之间的肤色差异则是这种主次关系的一种更具有说服力的补充和证明。或者反过来说，他们之间明确的肤色差异，正好说明了她们之间的主仆关系：黑人女性的深色皮肤天然就是用来映衬白人女性的白晰身体的，她只能作为“奥林匹亚”的背景而存在——无论是从画面上，影调上，构图上；还是从文化上，价值上和人种上。如果把提香的《乌尔比诺的维纳斯》引入这个语境来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在提香的作品里也存在人物的主仆关系和画面构成的主次关系，但这两种关系却并没有《奥林匹亚》中所表现出来的种族色彩。在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和亚平宁半岛已经可以看到有色人种的身影。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们也表现过这样的主题。但正如马奈的作品对提香作品进行戏拟不可能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马奈作品中的黑白差异和黑白对比也不太可能发生在那个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虽然已经有了“大航海”和对欧洲之外的世界的“地理大发现”，在欧洲内部却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视野和话语秩序。同时，在这种视野和话语框架之中的“我们”和“他们”的二元对立也没有成为欧洲人的文化常识。因为在提香的时代，既没有伦敦和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与“殖民地大帐篷”，也没有伦敦街头皇家庆典游行中的锡克族的头巾和波利尼西亚人的舞蹈，更没有大量印刷和流行的关于欧洲之外的世界的文字。

同时，我们不得不注意，与 19 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欧洲主流思想相配套，欧洲人文学科的

发展对这种二元对立框架的建立和强调也有直接的贡献。比如人类学 (anthropology) 的诞生。人类学者站在一个“更高级”的文明阶梯 (欧洲) 之上, 对于相对落后的文明或者文化进行考察, 以得到有关他们的种种知识。1855 年, 法国自然博物馆设立了人类学讲座, 1866 年, 召开了首次人类学国际大会, 1872 年, 《人类学杂志》创刊, 1876 年, 巴黎人类学学校建立。所有这些人类学的活动, 都与法国或者欧洲在海外的殖民活动相适应, 为法国推行所谓的“民族殖民”政策提供话语依据。“民族殖民”是对非文明的地区实施“文化”教育, 完成所谓“文明的使命” (la mission civilisatrice)。而这样一种使命的基石, 就是对法国或者欧洲之外的世界的“落后”的本质推断。更不用说, 人类学的这种诞生语境与当时更带种族偏见的人种学有着密切关系。当时流行的一种人类学理论, 是依据大脑的重量来鉴定不同人种的智力。根据人类学者的研究, “落后”文明或者文化中的人种, 因为其脑量较小, 所以属于“低劣人种”; 而人种的低劣, 则直接导致他们的落后^[12]。

马奈的作品中那个站在背景阴影里的黑人女性, 不是正呆呆地看着“奥林匹亚” (欧洲文明起源的象征或符号) 之美吗?

五

限于篇幅, 19 世纪文学艺术中所体现出来的欧洲认同当然不可能在这里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但从上面的文字中, 我们似乎已经可以看到几点重要启示。

作为一个在历史上很难厘清的概念, 欧洲认同从来就与欧洲的地理、文化边界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因为欧洲的地理特征和文化特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当然, 人们也许可以总结出一些所谓“欧洲特性”的要素, 但如果将这些要素 (人文主义, 民主人权, 基督教, 资本主义精神……) 视为欧洲特有, 则有可能落入视野狭隘的欧洲中心论的陷阱。事实上, 从上个世纪以来, 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学者都已经大量研究证明, 将这些要素作为欧洲文化或文明的本质特征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2]29}。从另一方面讲, 所谓欧洲认同或者欧洲身份在欧洲内部也从来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 以至于到了

19 世纪, 欧洲大陆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更是将这种有关欧洲一体的话语 (无论是对过往经验的总结还是对未来文明的前瞻) 击得粉碎。根据霍布斯邦的观察和判断, 从 1879 年法国大革命开始, 欧洲的历史进程就一直伴随着分裂、争霸和国家间战争的困扰, 这个过程延续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其实应该是欧洲大战) 的爆发^{[10]15}。如果一定要在欧洲历史上寻找到一个较为稳固统一的欧洲身份和认同, 似乎只可能在漫长的中世纪找到它的身影——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言, 一个统一的欧洲只能是一个怀旧的欧洲。

正是在中世纪, 由于基督教欧洲 (Christendom) 的存在, 更由于以“十字军东征”为标志的基督教欧洲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长久冲突, 欧洲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的特征才得以确立和显现。换句话说, 欧洲认同在此期间得以确立, 是因为基督教文明与非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 是因为基督教的“我们”与伊斯兰教的“他们”之间的能动性关系的存在。由于这种关系随着伊斯兰势力的逐渐式微和欧洲进入现代化进程而弱化, 因此, 基于基督教文化的所谓欧洲认同也随之不再发挥重要的区别性功能。伴随欧洲社会的不断世俗化, 这一情形发展至 19 世纪, 则被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热情和汹涌出现的民族国家所取代, 欧洲认同被各个新型民族国家不遗余力地追求民族认同的文化操作所淹没。

针对中世纪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欧洲认同, 或者 19 世纪在民族主义笼罩之下的欧洲认同, 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重要的特征, 那就是这两个阶段的欧洲认同, 都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欧洲与后者世界的关系之中。借用 B·安德森的说法, “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能够诞生, 其最直接的动因是需要“我们”与“他们”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 从而更加紧密地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如果欧洲身份或者欧洲认同也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的话, 那么它的实质也当然不出其右。

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 如果欧洲试图建立一个整体性的文化认同 (这种认同既可能反映在政治整合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 也可能反映在诸如《欧洲宪法》或“里斯本条约”的讨论和实施过程之中), 这个认同更可能在超

越于欧洲的一个更大的语境中完成。换句话说，欧洲认同不可能仅仅是欧洲或者欧盟的“内部事务”，而更可能是欧洲与世界之间的交往、对话、对抗的结果。迄今为止的欧盟的发展，也许就是因为只关注于欧盟成员国内部的“统一的多元化”的文化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无法破解欧洲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悖论，给欧盟自身的推进制造了某种困境。

更进一步看，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今天和未来的欧洲认同也许应该更自觉地摆脱从 19 世纪以降所建立起来的这种二元对立框架，摆脱优越的“我们”和他者之间的对峙，涤清其“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在全球化更加彻底，全球化语境复杂交织的今天，傲慢与偏见只能妨碍对话的进行。

参考文献：

- [1] Cohen, Elie. The Euro, Economic Federalism and Question of National Sovereignty [M]. 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Idea of Europe From Antiquity to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2] 莫兰, 埃德加. 反思欧洲 [M]. 康征, 齐小曼,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3] Delanty, Gerard. Inventing Europe Idea, Identity [M]. Real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1995.
- [4] DeQuincey, Thomas. Confessions of an Opium Eater [DB/OL]. Hypertext by Dave Cross, 1995, <http://users.lycaeum.org/~sputnik/Ludlow/Texts/Opium/>, 本文作者中译.
- [5] Wilson, Kevin & Dussen, Jan van der ed. The History of the Idea of Europe [M]. Routledge, New York, 2002.
- [6] Fontana, Biancamaria. The Napoleonic Empire and the Europe of Nations [M]. in Anthony Pagden (ed), The Idea of Europe From Antiquity to the European Un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2.
- [7] Hsia, Adrian. Chinesia The European Construction of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M]. Max Niemeyer Verlag, Tübingen, 1998.
- [8] Said. E Orientalism [M]. Vintage, New York, 1979.
- [9] Kipling, Rudyard. We and They in Dedits & Credits [DB/OL]. 1926 http://www.kipling.org.uk/poems_wethyey.htm 本文作者中译.
- [10] 霍布斯邦, 埃里克. 19 世纪三部曲·帝国的年代 [M]. 贾士蘅,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 [11] 弗朗兹·法农. 黑皮肤, 白面具 [M]. 万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 [12] 李正亮. 科学的殖民展示 [J]. 读书, 2006, (3): 58, 62.

The Dialectic of European Identification as Exemplified in 19th-Century Literature and Art

YI D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Emergence of nation-stat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building was a key historical scenario in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Besides the Romantic calls for an integrated Europe, identification of Europeans at the time was out of question inside Europe because of the vigorous nation building in various nation-states. Drawing examples from literature and art, this thesis tries to show that it was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 non-European cultures and interactions with them, the Europeans had established a common identity. Therefore, this thesis postulates that a European identity cannot exist without a global context, and a European identity building subsequently cannot be achieved merely within Europe.

Key Words: 19th-Century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Culture; European Identity; Global Context

(责任编辑: 龙石)